

再看百团大战

——关于《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 一文的商榷

邹 钺

内容提要 尽可能充分结合中日双方军事档案、日记与回忆材料重新考察百团大战，可以发现《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所刊《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一文提出之中心论点，即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改变既有战术原则，以攻击据点为主要作战任务，作战效能下降，缺乏足够史料支撑。总体而言，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遵循并尽可能发挥既有战术原则，获得之战果亦不差。百团大战之所以在党内引起争议，主因在于百团大战令日军更加重视八路军，八路军所处外部环境更趋恶劣。

关键词 百团大战 战术原则 作战效能 战果

近年来，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实际上多与战争史研究的基本对象——战史无太大关系。至于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较为细致的从战术与战果等方面讨论某一战役的专题研究就更少了。《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所刊《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以下简称“《百团大战》”）一文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只不过，文中提出的若干重要论点，缺乏足够说服力。笔者在此不揣简陋，提出几点商榷意见，以期深化对这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敌后战场上规模最大的战役性进攻之认识。

一、关于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战术的问题

《百团大战》一文提出，“在百团大战之前，虽然八路军各部队不乏成功袭击日军堡垒和据点的战例，但八路军总部更倾向于袭击运动中的日军，避免攻击日军的堡垒和据点。1938年1月八路军总部关于战术原则的训令要求：‘对驻止的敌人，如有坚强防御设备，不应强攻。’与此不同，百团大战之目的在于：‘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时

期截断该线交通。’因此,攻击日军的堡垒和据点成为八路军主要作战任务”。^①接着,文中指出八路军袭击据点不成,转为硬啃,并根据作战总结列出了一二九师与晋察冀军区部队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正太战役中攻击日军据点情况表,指出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击据点不力。8月23日前,仅攻克井陉新矿、南正和蔡庄三处,且南正和蔡庄的敌军自行退去。一二九师虽攻占了大部分据点,但往往需要长时间反复冲锋,对日军据点的突然袭击变成了强攻。^②

初读《百团大战》一文的这段论述,似乎非常有道理,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改变既有战术原则,攻坚不力,但参阅各种史料之后,则会发现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事实上,八路军总部1938年1月所发训令并非一般性强调不要攻击有防御设备的驻止之敌。该训令主要内容如下:

甲、由于我军及各游击部队在敌后方联络线上(正太、同蒲两线)之积极破坏、袭扰打击其往返部队,给敌不断损失,使敌甚感不安。一月来,敌人以保障其联络线安全之目的,除加强其沿联络线之戒备,无情镇压居民抗日运动,组织伪组织,推广其警戒线以外,更采取积极防御的动作,经常派遣多数支队兵力(从三百到二千人不等),并加强其技术兵种的协助,利用汉奸做向导,或伪装中国军队,或与汉奸部队混杂向沿线近旁之城镇,或被其查明之我军驻地与游击队根据地等,作脱离联络线远出二三天行程的分途袭击与合击(各支队间隔半天至一天行程)。其行动颇为灵动敏捷并具突然性,当发现我军时,即作突然的奇袭与强袭,或迅速展开其兵力与兵器进行包围迂回,作强烈的战斗,利用飞机、大炮向我轰炸,并不时伪装疏于侦察与警戒或伪装退却,以诱击、伏击我军或牵制我于正面,而以两侧支队包围我之翼侧,和常以敏捷的动作,迅速转移其兵力与兵器于新的突击方向。实施这些手段之唯一目的,即在于肃清或驱逐沿联络线之我军与游击队,力求消耗与消灭我之有生力量,以巩固其联络线之安全。然而在敌人这种行动与方法中,暴露了不少的弱缺点。

- 1、兵力分散,给我各个击破之利。
- 2、进入山地,技术兵器减少了作用。
- 3、外翼侧完全是暴露的。
- 4、远离后方联络线,一切供给困难。
- 5、与群众是对立的。

乙、抓住敌人的弱点,发挥我军运动战游击战之特长,求得不断的大小胜利是极大可能的。然而敌人疯狂般的活动未能给以不断的重大的打击,相反的还遭了不应有的个别的损失,这不能不指出部队的战斗动员还不够和战术上的薄弱。

丙、对于上述敌人作战的战术的原则,指示如下:

.....

9、对驻止的敌人,如已有坚强防御设备,不应强攻,而应向之佯动,诱动其他方向敌之增援,求得在运动中突然袭击增援之敌。

.....^③

① 齐小林:《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第61页。

② 参见齐小林:《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第61—63页。

③ 《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关于战术原则的训令》(1938年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页。

显然,这一训令乃是针对拥有“三百至二千人不等”日军士兵的铁路护路支队。按照日军估计,在执行进攻任务时,日军一个大队可以对付中国军队一个师;在执行防御任务时,日军一个中队可以对付中国军队一个师。^①因而八路军即便集中一个主力团,也很难歼灭日军一个中队。八路军总部在训令中要求各部不要强攻至少拥有300名日军的驻止防御之敌,完全合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八路军方面不主张袭击、强袭甚至强攻日军以分队、小队为单位驻守的小据点。一二〇师抗战第一周年所进行的46次较大规模夜间战斗基本为“袭击驻止或守据点之敌”。^②据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统计,该团在百团大战前三年多的时间内所进行的58次较大规模战斗中,袭击、强袭驻止或守据点之敌的战斗次数为:1938年4次,1939年8次,1940年前8个月7次,总计19次,占战斗总数32.76%;破袭车站、铁路15次;被敌袭击、解决汉奸武装、反顽、非预期遭遇及反扫荡内线突围等战斗14次;伏击战、急袭10次。^③冀中军区则这样总结道:“在平原上的进攻战斗,经常是由袭击和强袭驻止之敌,以及对付向我袭击之敌进行反击”,“要袭击据点就要给以消灭的打击,以使敌伪不敢以小部队随便出来建立据点”,“若我已占领有利阵地或敌已被我消灭大半或一部时,则可依我之主力火力压制敌人继续攻击或转为强攻,不可轻易放弃,使功败垂成”。^④因此,八路军方面赞同袭击、强袭乃至强攻日军的小据点。1938年1月所发训令无法如《百团大战》一文那样推而广之,用于强调八路军一般倾向于“避免攻击日军的堡垒和据点”。

《百团大战》一文提出的论断,“百团大战之目的在于:‘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因此,攻击日军的堡垒和据点成为八路军主要作战任务”,也存在明显问题。这一论断所引史料来源于八路军总部1940年7月22日下达的战役预备命令。对于这一命令,《百团大战》一文存在误读和曲解。其一,此命令并非针对整个百团大战,而仅仅是对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正太战役。该命令中已非常清楚地指出战役目标为破击正太路:“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⑤其二,此命令所提出的作战重点不是攻坚,而是截断交通线,即“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⑥正因如此,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8月8日发出之正太战役战术指示中强调:“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之程度为定。因此,破坏工作为此战役中最中心之环节。”^⑦一二九师作战总结亦将正太战役重点归结为破路。^⑧而《百团大战》一文舍去“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一句,改变了整个命令的原意,误将攻坚作为

① 《参谋次长泽田茂回忆录》,芙蓉书房1982年版,第111页,转引自户部良一《华中日军:1938—1941——以第11军的作战为中心》,杨天石、臧运祜编:《战略与历次战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② 《第120师抗战一年来军事报告》(1938年7月10日),杨弘、卢云山编:《周士第将军阵中日记》,内部资料,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印刷厂2005年印,第310页。根据报告内容,这里的袭击包括强袭。

③ 参见《第772团抗战四年战斗总结报告(1937—1940)》(1941年9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109团历史资料汇编》,红军团史编写组1993年8月编印,第277—286页。

④ 第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部印:《三年来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关于战术问题的参考》,1940年8月。

⑤ 《战役预备命令》(1940年7月22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编:《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⑥ 《战役预备命令》(1940年7月22日),《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15页。

⑦ 《关于百团大战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1940年8月8日),《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23页。

⑧ 《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1940年),何理、王瑞清、刘威编:《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1页。

战役的主要任务。

八路军以截断正太路交通为主要作战任务时,对日军据点发动攻击,乃是遵循既有战术原则。袭击甚至攻占交通线上的部分日军据点,从来就是截断日军交通线作战的题中之意。一方面,所谓破击战,乃是“敌人在据点的铁路、公路上驻止,我军去进攻的一种方式”。^①为保障确实破路,须监视、袭击甚至攻占部分日军交通线上之据点,正如时任冀南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所说:“铁路公路敌人控制着,我们先得用部队攻下据点,消灭或打退敌人,控制住一段路,然后军民一拥而上,一齐动手,开始破路。”^②另一方面,交通线上的部分日军据点是兵站与辎重囤积之所,攻占后将完成截断日军交通线作战的另一目标,取得大量补充物资。^③因此,八路军在破击战中常常会袭击与夺取部分据点。如1940年4月冀南区破击日军交通线的预想是“打掉沿公路的碉堡据点;彻底破坏敌人通信联络;平毁封锁沟”。^④5月太行、太岳区白晋路破击战中,北段破击队“进攻子洪口碉堡,打退子洪口出击上下王庄之敌……也打退了东观南开火车,完成了掩护中段破击队的任务”^⑤;中段破击队之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于5日20时开始破击南关至土门段。6日1时将南关街占领大半,6时将敌两个坚固碉堡全部攻占,守敌200余人大半被我消灭,夺获军用品一部,解放修路工人一批,残敌固守街中二三个据点,直至7号拂晓仍有残敌30余人固守复廊未完全肃清”^⑥,边纵攻击南沟兵站与附近铁路工物,“炸毁了火车头,烧坏了大批车厢、枕木和汽车,攻占了敌人工事,破坏了堡垒”;南段破击队攻入“牛寺、漳源、固亦,与敌反复肉搏,并击退火车一列”,令“故城敌人不敢迂回中段破击队之左侧背”,并拔除赵城日军刘家庄据点。^⑦1941年5月,冀南军区新七、八旅、骑兵团及各分区武装进行“五昼夜大破击战役”,“攻克据点八处”。8月底,冀南军区新四、七旅及地方武装进行秋季第一次破击战役,“攻克据点23处,独立碉堡105个”。9月中旬,冀南军区新四、七、八旅及地方武装进行秋季第二次破击战役,“攻克据点七个,独立碉堡三座”。10月中旬,冀南军区新七旅、军区特务营、骑兵团及地方武装进行秋季第三次破击战役,“攻克据点四处,碉堡五座”。^⑧反观八路军百团大战正太战役作战部署,其中,一二九师正太战役作战部署仅要求破击队攻占有碍破路的小据点:

(一)右翼破击队——以二十八团三十团附平射炮一门、机关炮一门、工兵两个连组成之,受第十旅旅长范子侠、政委赖际发同志指挥;其任务是破击阳泉(含)至寿阳(不含)段,对于燕子沟、桑掌、辛庄、小庄工物必须确实破坏。为得确实破击并须袭占其据点。

(二)左翼破击队——由十六团决死一纵两个团、附机关炮一门、工兵两个连及榆太两独立营组成之,受六旅参谋长周希汉同志指挥;其任务是破击寿阳、榆次(均含)段,特别确实破

① 《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1940年5月20日),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军事文选编辑组:《刘伯承军事文选》(1),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页。

② 王宏坤:《再忆征战生涯》,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③ 刘伯承指出,截断日军交通线目的有二,一为截断铁路与汽车路;一为劫夺或烧毁兵站辎重。《对目前战术的考察》(1939年8月22日),《刘伯承军事文选》(1),第212页。

④ 王耀南:《王耀南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09页。

⑤ 《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1940年5月20日),《刘伯承军事文选》(1),第302页。

⑥ 《三八五旅白晋路北段破击战役战斗详报》(1940年5月5日—7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抗日战争战史附件·资料选编》,出版信息不详,第15页。

⑦ 《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1940年5月20日),《刘伯承军事文选》(1),第304—305页。

⑧ 刘伯承:《第一二九师一九四一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12月),《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室1962年编印,第90—93页。

毁马首村、郭村、和尚足、芦家庄术工物。为确实破毁这些术工物,并须袭占其附近据点。对于榆次方面之敌情应随时查报。^①

晋察冀军区的正太战役部署,较一二九师更富有弹性。该军区作战部署如下:

(甲)、第五团、十九团、二分区特务营附冀中炮兵两个连为右纵队,均归郭天民(司令)、刘道生(政委)统一指挥,大举击破娘子关(含)至乱柳(含)段之敌,并将重点指向娘子关、磨河滩、上下盘石、移穰各点;同时大施破坏各该点附近之铁路、桥梁、车站、路轨及隧道,另以小部确实截断乱柳(含)以西之铁道交通后,主力一部转向阳泉方向发展,扩张战果,与一二九师联络;另以小部向巨城敌据点积极袭扰与监视之,并相机收复该据点。二分区特务营及游击队,应同时积极动作于东会里、河底、孟县、上下社、北会里间及其以东地区,掩护右纵队右侧后,相机收复某些据点。二分区之二支队以得力之一部应同时进入孟县以西北地区,向孟黄公路及孟县至北会里间积极破袭之,相机收复某些据点,并与一二〇师联络。

(乙)、第二团、第三团、十六团及井获支队附冀中炮兵一个连为中央纵队,均归杨成武(司令兼政委)统一指挥,大举袭破娘子关(不含)至微水、井陉煤矿(均含)段之敌,大施破坏铁道、桥梁、路轨、车站及煤矿,重点置于北峪、乏驴岭、蔡庄及煤矿,以小部积极袭扰与监视贾庄之敌,相机收复上述之各要点,奏效后以得力一部沿铁道向娘子关扩张战果,与右纵队联络,主力转向井陉、微水进攻;另以一部控制煤矿东北适当地区,对平山之敌严密侦察警戒之,掩护自己的侧背,并与左纵队联络。

(丙)、冀中区警备旅第二团、军区特务团主力(缺一个营)、井支一部为左纵队,归熊伯涛(司令兼政委)统一指挥,大举袭破微水(不含)至石家庄(含)段铁道,以及石家庄至平山和平山至微水之公路,大施破坏铁道、桥梁、车站、道轨及公路,并将重点置于岩峰、上下安、头泉,以小部队或便衣确实截断石家庄至获鹿之铁道交通,与石家庄至平山之公路及平山至微水之公路,和平山城西之冶和桥,阻止敌之增援,收复某些据点,须确保与警备旅二团之联络。

(丁)、军区骑兵第一团主力(缺一个营)、行灵游击支队、四分区之骑兵连为独立支队,均归叶长庚(司令)、蔡顺礼(政委)统一指挥,大举破袭石家庄至新乐间之平汉路及平山、灵寿间、灵寿、正定间与行唐、长寿间之公路,务须使之一周内不能通车,以阻止敌之增援,并以一部掩护运粮并监视灵寿之敌。

(戊)、津南自卫军、特务团之一个营、四分区特务营为总预备队,均归张仲翰(司令)、贺庆积(政委)统一指挥,以得力一部向回舍、白塔坡、平山等据点之敌积极袭扰钳制之,并彻底破袭该地区敌之公路。主力于十九日隐蔽集结洪子店及以南地区积极备战,待命行动并注意与本部确保联络。^②

在晋察冀军区部署中,各部除了需要大举破击日军交通线外,对于日军据点的任务分别是:右纵队重点攻击娘子关、磨河滩、上下盘石各点之敌,“监视”与“相机收复”巨城据点;中央纵队重点攻击北峪、乏驴岭、蔡庄及煤矿之敌,袭扰与监视贾庄之敌,并“相机收复”这些日军据点;左纵队重点攻击岩峰、上下安与头泉各点,以小部队“阻止敌之增援,收复某些据点”;总预备队对回舍、白塔坡与平山等据点“积极袭扰钳制”。也就是说,晋察冀军区给予下级相当自主权,并无要求必须攻

① 《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1940年),何理、王瑞清、刘威编:《百团大战史料》,第209—210页。

② 《军区战役详细部署命令》(时间不详),《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65—66页。

占某个据点,钳制日军意图明显。^①

显而易见,一二九师与晋察冀军区的正太战役部署与八路军的一贯破击作战部署无本质差别。也正因如此,百团大战指挥者之一、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回忆正太战役时,谈道:“对正太路进行破袭,我完全赞成,这是我们在游击战争中经常进行的,几乎天天都在破袭嘛,这有什么不可以!”^②

总起来看,《百团大战》一文所运用的史料,基本上不能说明较之百团大战前,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战术原则与作战任务整体上发生改变。

二、关于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作战效能的问题

《百团大战》提出的另一重要论点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袭击作战演变成攻坚,导致其作战效能下降”。^③而用来支撑八路军作战效能下降的主要论据是,与百团大战前的统计数据相比,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毙伤一名日伪军耗费弹药量急剧上升。据八路军方面统计数据,晋察冀军区部队毙伤一名日伪军所耗弹药量,在1939年雨季反扫荡中为80发,冬季反扫荡中为59发,1940年上半年战斗中为53发,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为步机弹105.6发,手榴弹5.3枚,第二阶段为步机弹79.6发,手榴弹7.5枚。一二九师部队毙伤一名日伪军所耗弹药量,在抗战第一周年为62发,抗战第二周年为45发,抗战第三周年为138发,百团大战中为101.2发。^④

不可否认,毙伤一名日伪军所耗弹药量的变化确可说明作战效能的变化,但前提是能够较准确计算毙伤一名日伪军所耗弹药量。其中,最关键一点是应用日伪军战史资料所记日伪军伤亡数,而非八路军战果统计资料记录的日伪军伤亡数,计算毙伤一名日伪军耗费弹药量。

众所周知,“除了绝对控制战场或缴获了对方全部档案的情况下,一般只能较精确地统计俘虏对方的人数,至于杀伤对方数字主要靠估计。尤其是在使用远射程的攻击武器时,战果更要靠猜测”。^⑤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有多少战斗完全控制了战场呢?八路军在战争中的确夺取了部分日军据点,全歼日军。但是,数量众多的小规模袭击战,实际上扑一下就走,并没有控制战场。甚至耳熟能详的一些重要战斗,如齐会战斗、雁宿崖与黄土岭战斗、双峰战斗以及关家垸战斗等等,八路军也没有完全掌握战场。因此,八路军对于战斗中毙伤日伪军数的统计必然有很大估计成分,而估计数字又常常与日军方面的内部伤亡统计数字有着相当差距。^⑥兹举两例如下。

例一,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长乐村战斗:“敌向772团数次反复冲锋,均被我有组织之火力射杀,伤亡甚重,目睹达200余人”,“据战后我们确实统计,敌死伤2200以上”。^⑦

① 如攻击开始后,右纵队第五团一部20日夜袭击娘子关不成,即迅速转移兵力,主力掩护破路,小部与敌军对峙;第五团第二营20日夜袭击磨河滩,21日夜仅以一个连继续袭击,显然也转移了兵力。参见《晋察冀军区百团大战总结报告(摘要)》(1941年1月26日),何理、王瑞清、刘威编:《百团大战史料》,第97—98页。

②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95页。

③ 齐小林:《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第68页。

④ 参见齐小林:《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第68—69页。

⑤ 徐焰:《第一次较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

⑥ 关于日军统计数字准确性的评估,可参见姜克实《台儿庄战役日军死伤者数考》,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2014年第3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8—71页。

⑦ 《陈赓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90—91页。

但据日军战后统计,参加该次战斗的一〇八师团苦米地支队仅伤约200人,亡70人。^①

例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1941年2月报告中谈到,1940年10月底,一二九师将日军300余人包围于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彭德怀、左权及刘伯承等人亲自指挥攻击。经过激战,五六十名日军突围逃走。^②换言之,八路军方面估计此战日军被歼约250人。不过,据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战斗详报,此战被围日军伤99人,亡50人,总计伤亡149人。^③

无论长乐村战斗,还是关家垴战斗,都是身经百战的八路军高级军官亲临前线指挥。但战后估计敌军伤亡情况时,仍然不准确。至于下级上报的估计毙伤敌军数字,那就更容易出现误估了。

除己方实际上很难对毙伤敌军数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外,阅读中共军事档案不能忽视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档案制作者有意识地夸大毙伤敌伪军数字。如晋绥军区在1943年所发训令中严肃提出:“军区特别要求各级司令部给军区的各种报告、统计要确实、具体与及时,否则,报告毫无价值,甚至有害。举一个例子,有些部队的战斗报告,胜利时夸大自己的胜利以加其功,失利时夸大敌人以减其过。这样不能使上级了解真实的情况,对敌人和我军的战斗力、战术都会作出不正确的估计。这是必须彻底纠正的”。^④

事实上,不仅军分区或团级司令部上报之统计数字存在有意识夸大战果问题,就是军区一级的军事总结报告同样有增报现象。如晋察冀军区百团大战总结任河大肃战役一项统计列出,冀中军区作战111次,歼敌1127人,缴获掷弹筒1具、轻机枪5挺、步马枪259支、短枪50支、冲锋枪6支、迫击炮1门。^⑤ 可据冀中军区的战役总结,“全战役共计战斗三十四次(实数),毙伤敌伪军七?一八(原文如此——引者注)名,内毙有肃宁敌守军司令竭田,副司令敌反X(原文如此——引者注)、顾问永石孟等三名,俘虏伪军八十?九(原文如此——引者注)名,缴获长短枪八〇三支,轻机枪八挺,迫击炮二门,掷弹筒四个,望远镜十一个(以上均系倍数),其他军用品甚多,共收复据点十五个(实数)”。^⑥ 也就是说,冀中军区在任河大肃战役中,实际作战34次,估计毙伤日伪军实际数字应为360人左右,实际缴获武器为长短枪400支左右,轻机枪4挺,迫击炮1门,掷弹筒2具。可见晋察冀军区百团大战总结关于任河大肃战役作战次数与毙伤日伪军数的统计有相当夸大。

所以,《百团大战》一文所列各个时段八路军毙伤一名日伪军耗费弹药量的数据并不准确。因为,无论这些数据是依靠统计材料重新计算得出,或是八路军军事档案直接提供,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日伪军伤亡数并非依据日伪军方面的统计数据,而是八路军的战果统计数据。

也正因这种不准确,《百团大战》一文讨论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作战效能时存在难以摆脱的困境。据《百团大战》一文利用的资料汇编《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所提供的一二〇师战果统计数字,可以发现一二〇师在百团大战中所展现的作战效能完全不能支持其结论。如表1所示,一二〇师统计,抗战四年间,该师毙伤敌军一人或一马所需总弹药数由第一周年199.976发,降为第二周年148.516发,再降为第三周年141.359发,直至降至第四周年前半

①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969600、第1軍機密作戦日誌 卷12—13 昭和13年4月1日—13年4月3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② 参见《杨尚昆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1941年2月19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415页。

③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396500、獨立混成第4旅団第2期晋中作戦戦聞詳報 昭和15年10月19日—15年11月14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④ 《晋绥军区训令》(1943年3月19日),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编:《贺龙文选》(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页。

⑤ 参见《晋察冀军区百团大战总结报告(摘要)》(1941年1月26日),何理、王瑞清、刘威编:《百团大战史料》,第185页。

⑥ 《冀中任河大肃战役初步总结》(1940年10月30日),《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96—97页。

年 70.273 发。也就是说,尽管一二〇师在抗战第四周年前半年中的主要作战行动是进行百团大战,但该师毙伤敌人一人或一马所需弹药还是远远低于抗战前三年,与《百团大战》一文所列一二九师与晋察冀军区部队毙伤一名日伪军所需弹药数的变化情况相反。

表 1 一二〇师抗战四年间毙伤敌人一人或一马所耗弹药变化表

	抗战第一周年	抗战第二周年	抗战第三周年	1940 年 7 月 8 日至 12 月
步马枪弹	147.781	101.94	96.424	46.933
驳壳枪弹	0.968	1.29	1.296	0.318
手枪弹	0.099	0.105	0.09	0.027
轻机枪弹	39.872	32.518	35.684	18.519
重机枪弹	7.087	8.61	4.52	2.192
冲锋枪弹	1.444	1.764	0.999	0.295
掷弹筒弹	0.004	0.012	0.005	0.011
迫击炮弹	0.143	0.156	0.079	0.041
山炮弹				0.027
机关炮弹				0.001
手榴弹	2.578	2.121	2.262	1.909
总计	199.976	148.516	141.359	70.273

说明:资料“总计”栏中所给抗战第一周年、第三周年以及 1940 年 7 月至 12 月数字有误,现所列数字乃重新计算结果。

资料来源:《八路军第 120 师抗战以来消耗弹药与伤毙敌人比较表》(1940 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2),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45—846 页。

既然《百团大战》一文中用以参照比较的两组数据,即百团大战前毙伤一名日伪军耗费弹药量与百团大战中毙伤一名日伪军耗费弹药量并不准确,自然也就不可能证明“百团大战中袭击战术使得战斗效能下降”。而前文述及之求得毙伤一名日伪军耗费弹药量的合理方法,即以己方弹药消耗量与敌方关于战场伤亡情况的统计数字作除法,依据现有资料的公开程度,是一相当困难的任务。不过,笔者还是尝试粗略提供五组数据,以便深入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

数据 1,八路军在青羊口、口泉、细腰涧战斗中毙伤一名日军所耗子弹量。据一二〇师统计,该部在青羊口、口泉、细腰涧战斗中消耗步马枪弹、机枪弹、驳壳枪弹及手机枪弹共 121474 发。^① 据日军统计,青羊口、常品里战斗中伤 13 人,细腰涧战斗中伤亡 56 人。因此,日军在青羊口、口泉、上下细腰涧战斗中伤亡 69 人。^② 故八路军在青羊口、口泉、上下细腰涧战斗中毙伤一名日军耗子弹 1760.49 发。

数据 2,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毙伤一名日军所耗子弹量。据统计,晋察冀一分区部所属第一、三团以及该分区配合作战部队在两次战斗中消耗 10.6 万余发子弹。^③ 因参加雁宿崖与黄

① 参见《神堂堡细腰涧战斗详报》(1939 年 5 月 16 日)、《五月份上半月各次战斗详报》(1939 年 5 月 23 日)、《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一二〇师战史》编写办公室 1994 年编印,第 340—341 页。档案中给出的弹药消耗总数计算有误,文中所用乃是重新计算的数字。

② 参见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981400、第 1 軍機密作戦日誌 卷 33 昭和 14 年 5 月 1 日—14 年 5 月 31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981500、第 1 軍機密作戦日誌 卷 33 昭和 14 年 5 月 1 日—14 年 5 月 31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需要注意的是,日军战史资料中所载常品里战斗,应是八路军战史资料中所称口泉战斗或口泉、常品里战斗。

③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1939 年 12 月 14 日),《杨成武军事文选》编辑组编:《杨成武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8 页。

土岭战斗的晋察冀三分区第二团以及参加黄土岭战斗的一二〇师特务团并未计入一分区的消耗统计,故八路军在这两次战斗消耗子弹数应远远超过10.6万余发。若估计晋察冀三分区第二团与一二〇师特务团在这两次战斗中消耗3万发子弹^①,那么,八路军在这两次战斗中一共消耗13.6万余发子弹。又据驻蒙军事后调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伤亡总数约210人^②,故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毙伤一名日军约耗子弹647.62发。

数据3,晋察冀军区部队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正太路作战(8月20日至31日)毙伤一名日军所耗子弹量。据晋察冀军区统计,参加正太路作战的该军区部队共消耗步机枪弹5.7万发。^③而据日军华北方面军统计,晋察冀军区部队正太路作战的攻击重点之一,独立混成第八旅团8月伤亡总数为118名。^④至于晋察冀军区部队正太路作战的另一攻击对象,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在娘子关一带的伤亡数,现有材料虽无法提供确切数字,但估计独立混成第四、八旅团因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正太路发动的攻击而伤亡达到120人左右应属合理。因此,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正太路作战中,晋察冀军区部队毙伤一名日军约耗子弹475发。

数据4,晋察冀军区部队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涞蔚战役中毙伤一名日军所耗子弹量。据晋察冀军区统计,该军区部队在涞蔚战役中消耗步机枪弹、驳壳枪弹及手机枪弹共59729发。^⑤又据日军统计材料,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在1940年9月中伤89人,亡162人,总计251人。^⑥考虑到晋察冀军区主力大部抽调参加正太战役,直至涞蔚战役开始前才秘密向涞源一带集结,可大致判断涞蔚战役前,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出现较大伤亡的可能性极低。^⑦该旅团在9月间的伤亡应基本源于涞蔚战役。故涞蔚战役中日军伤亡约有250人,八路军毙伤一名日军约耗子弹239.17发。

数据5,晋察冀军区部队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灵浑战役中毙伤一名日军所耗子弹量。据晋察冀军区统计,所部在灵浑战役中消耗步机枪弹与手机枪弹共21709发。^⑧不过,日军在灵浑战役中的伤亡数字无较准确统计。只能据第二十六师团独立第十二步兵联队战斗详报,得知该部南坡头与枪风岭据点受晋察冀军区部队袭击,伤亡52人。^⑨所以,仅能用第二十六师团南坡头与枪风岭战斗中受伤人数暂代灵浑战役中日军伤亡人数,计算得出灵浑战役中,晋察冀军区部队毙伤一名日军至多耗子弹417.48发。

比较上述五组数据,可发现八路军在青羊口、口泉、上下细腰涧战斗与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毙

① 参加雁宿崖战斗的主攻部队为晋察冀一分区第一、三团与晋察冀三分区第二团;参加黄土岭战斗的主攻部队为晋察冀一分区第一、三团、晋察冀三分区第二团与一二〇师特务团;曾支队与第二十五团等部行游击牵制。据一二九师七七二团的战斗统计,1941年前,该团伤亡超过150人的战斗中所耗费之弹药基本超过2.5万发。以此为参照,因雁宿崖与黄土岭战斗中,晋察冀三分区第二团与一二〇师特务团伤亡不少于300人,大致估计作为主攻部队参加雁宿崖与黄土岭战斗的晋察冀三分区第二团与一二〇师特务团消耗子弹达3万发应不夸张。参见《第772团抗战四年战斗总结报告(1937—1940)》(1941年9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109团历史资料汇编》,第277—286页。

② 参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7091447900、昭和15年「陸支普大日記第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③ 参见《晋察冀军区百团大战总结报告(摘要)》(1941年1月26日),何理、王瑞清、刘威编:《百团大战史料》,第203—204页。

④ 参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934800、北支那方面軍状況報告および同別冊 昭和16年7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⑤ 参见《晋察冀军区百团大战总结报告(摘要)》(1941年1月26日),何理、王瑞清、刘威编:《百团大战史料》,第203页。

⑥ 参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934800、北支那方面軍状況報告および同別冊 昭和16年7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⑦ 据日军统计,1940年8月间,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伤亡数仅为4人。参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934800、北支那方面軍状況報告および同別冊 昭和16年7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⑧ 参见《晋察冀军区百团大战总结报告(摘要)》(1941年1月26日),何理、王瑞清、刘威编:《百团大战史料》,第203页。

⑨ 参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476400、獨立歩兵第12連隊第1中隊戦闘詳報(中共の百団攻勢に対する12isの戦闘)昭和15年10月9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伤一名日军所耗子弹量明显高于百团大战中毙伤一名日军所耗子弹量。当然,仅依靠这五组数据,并不能完全证明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的作战效能高于百团大战前。但可以肯定的是,与百团大战前相比,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的作战效能应没有下降。

三、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的战术原则与战果

总之,《百团大战》一文的史料与论证,无法支持该论文的基本观点: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改变既有战术原则,以攻坚为主要任务,作战效能下降。^①

交通破击战,不仅如前文所述,是八路军抗战以来一直进行的“日常工作”。而且,随着日军的“囚笼政策”愈演愈烈,八路军亦愈益重视破击战。刘伯承形象地比喻:“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成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破坏了铁路、公路,那碉堡就没有作用了。这等于囚笼的柱子、链子被截断了,锁就没有用处了”。^②为收到更大的破击效果,八路军方面期望组织大规模破击,刘伯承提出:“宽大正面的破击,收效更大。”^③百团大战之正太战役乃是八路军集中兵力以求更大发挥破击战威力之结果。

随着日军主要交通线在正太战役中被截断,交通运输瘫痪,兵力转运不灵,部署部分错乱,八路军转移兵力打击敌之薄弱处也属必然。国民党军卫立煌部能够利用日军交通线被八路军打断的有利时机,集结有力部队进攻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以图收复晋城,八路军自然也会抓住战机,拔除深入根据地的某些据点。正如八路军总部1940年8月27日致三个战略区首长电中所言:“我在正太沿线能坚持愈久破坏愈是彻底,可能逼使敌人改变其某些部分之兵力部署,从其他点线上抽调兵力增援正太。这给我寻求新的机动的方便或逼使敌人放弃正太线南北某些据点,回救正太线。”^④百团大战第二阶段集中兵力以进行拔除日军小据点为主的作战,乃是第一阶段交通破击发展的可能趋向。

百团大战的一大特点,即八路军集中四五个团进行的运动战在短时间内接连出现,同样是遵循既有战术原则的结果。八路军早在进入华北之初,即已提出对于日军“扫荡”,“在山地以我军三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大队”的设想^⑤,以迫使“敌人至少要以一个联队为单位作一路进攻,倘若少此数,比如以连为单位,那么敌人一师团就可以出兵几十路,将大大增加我们的困难”。^⑥对此,各部均表示赞同,努力集中兵力歼敌,只是作战结果总不理想。齐会战斗、陈庄战斗、雁宿崖与黄土岭战斗以及米峪战斗中,八路军方面虽集中三个团甚至更多的部队,但都未能成功给予日军以歼灭性打击。随着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交通破击战与第二阶段拔除据点作战的展开,日军调动兵力反击,战机出现,八路军集中兵力,再次试图在运动战中予敌较孤立之一个大队予以歼灭性打击。如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与决死一纵在双峰镇试图歼灭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永野支队;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一二九师三八五、三八六旅及决死一纵在红崖头南北山地伏击武乡日军援军。^⑦

① 参见齐小林《装备、技术、战术及作战效能: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2期,第61、67—69页。

② 《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1940年5月20日),《刘伯承军事文选》(1),第301、310页。

③ 《白晋铁路大破击的战术总结》(1940年5月20日),《刘伯承军事文选》(1),第306页。

④ 《正太线破坏愈彻底则我愈主动》(1940年8月27日),《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32页。

⑤ 《建军报告》(1945年3月1日),《陈毅传》编写组编:《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页。

⑥ 《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险坚持华北抗战——十月二十五日十八集团军彭德怀副总司令在晋东南的演讲》(1939年),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2),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55页。

⑦ 《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总结》(1940年),何理、王瑞清、刘威编:《百团大战史料》,第216—217页;《三八六旅百团大战三次战役各个战斗经过及经验教训》,《史料汇编·抗日战争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229、245—246页。

表2 百团大战前与百团大战中部分重要战斗及战役八路军与日军伤亡统计

战役、战斗名称	时间	八路军伤亡	日军伤亡	八路军与日军伤亡比
长乐村战斗	1938.4.16	800余	270	3.33:1—3:1
青羊口、口泉、细腰涧战斗(简称“细腰涧战斗”)	1939.5.9—15	344	69	4.99:1
陈庄战斗	1939.9.25—30	800余	141	6.38:1—5.67:1
雁宿崖与黄土岭战斗	1939.11.3—8	800余	210	4.05:1—3.81:1
米峪与二十里铺战斗	1940.6.17—19,7.4—5	825—925	168	5.51—4.91
晋察冀百团大战正太战役第一期作战	1940.8.20—31	559	120	4.66:1
涞蔚战役	1940.9.22—31	1065	250	4.26:1
榆社攻坚战	1940.9.23—25	528	97	5.44:1
南坡头战斗	1940.10.8—9	53	36	1.47:1
关家墙攻坚战	1940.10.29—31	600余	149	4.7:1—4:1

说明:(1)参加陈庄战斗的日军部队为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据日军的统计,独立混成第八旅团1939年9月间总共伤亡141人,故陈庄战斗中日军伤亡数至多就是141人;

(2)长乐村、陈庄、雁宿崖与黄土岭以及关家墙战斗中八路军的伤亡数字没有精确到百位之后,故只能求出八路军与日军伤亡比的大致波动范围。其中,长乐村、陈庄与关家墙战斗中八路军伤亡最低值取800、800、600,最高值取900、900、700,雁宿崖与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伤亡最低值取800,最高值取850。据《八路军·表册》所载,黄土岭战斗八路军的伤亡为300余人。因雁宿崖战斗中八路军伤亡为450余人,所以,八路军在雁宿崖、黄土岭之战中的总伤亡最多不会超过850人;

(3)据日军资料,长乐村战斗中与其作战者为八路军与国民党军,故八路军实际毙伤日军数应少于270人。这里无法详细分出,只好将这270人全部归入八路军毙伤数;

(4)米峪战斗与二十里铺战斗,都为晋西北夏季反扫荡战役中的战斗。其中,米峪战斗八路军伤亡425人,二十里铺战斗伤亡400余人,故而这两次战斗八路军伤亡的总人数应在825—925人间。至于这两次战斗所毙伤之日军数目,因现有材料无法详细区分,故用日军晋西北夏季反扫荡战役中的伤亡总数暂代;

(5)晋察冀百团大战正太战役第一期作战与涞蔚战役中日军的伤亡数是估计数字。估算方法参见本文第二节数据3、数据4。

资料来源:《神堂堡细腰涧战斗详报》(1939年5月16日)《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5),第340页;《朱德、彭德怀关于击毙敌伪部规范秀的战斗经过经秦邦宪、叶剑英转致蒋介石电》(1939年12月8日),《八路军·文献》,第420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401、416、417、426、428、430页;《晋察冀军区百团大战总结报告(摘要)》(1941年1月26日),何理、王瑞清、刘威编:《百团大战史料》,第203页;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969600、第1軍機密作戦日誌 卷12—13 昭和13年4月1日—13年4月3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981400、第1軍機密作戦日誌 卷33 昭和14年5月1日—14年5月3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981500、第1軍機密作戦日誌 卷33 昭和14年5月1日—14年5月3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7091447900、昭和15年「陸支普大日記 第5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990000、第1軍作戦経過の概要(西北山西作戦) 昭和15年6月6—15年7月8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0934800、北支那方面軍状況報告および同別冊 昭和16年7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476700、獨立歩兵第12連隊第1中隊戦闘詳報(中共の百団攻勢に 対する12isの戦闘)昭和15年10月9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793900、昭和16年「陸支密大日記 第5号 3/4」(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396500、獨立混成第4旅団第2期晋中作戦戦闘詳報 昭和15年10月19日—15年11月14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简言之,就战术原则而言,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并未从整体上改变既有原则,而是遵循与尽可能发挥既有原则。也许正因如此,彭德怀在1945年2—7月于延安召开的华北地方军队同志座谈会(简称“华北座谈会”)上总结性地谈及百团大战问题时,提出“这个仗可以打,但延长三

天不对”。^①

作战结果,较之百团大战前,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毙伤一名日军所耗子弹量未增多,八路军与日军的伤亡比亦未明显变化。如表2所示,在长乐村战斗、细腰涧战斗、陈庄战斗、雁宿崖与黄土岭战斗、米峪与二十里铺战斗、晋察冀军区正太战役之第一期作战、涞蔚战役、榆社攻坚战、南坡头战斗以及关家垸战斗中,八路军与日军伤亡比分别为约3.33:1—3:1间、4.99:1、6.38:1—5.67:1间、4.05:1—3.81:1间、5.51—4.91间、4.66:1、4.26:1、5.44:1、1.47:1、4.7:1—4:1间。百团大战部分重要战斗、战役的伤亡比多高于长乐村、雁宿崖与黄土岭战斗,低于细腰涧战斗、陈庄战斗、米峪与二十里铺战斗。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毙伤一名日军所付之伤亡代价亦未有明显增高。

而且,从八路军弹药消耗与缴获比观察,八路军的战绩亦属不错。关于百团大战前八路军对日军作战中的弹药消耗与缴获情况,可以从作战电报、战斗详报与工作总结报告中得到相当之提示。如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战斗中,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消耗子弹25527发、手榴弹617枚,缴获子弹5700发、手榴弹0,子弹消耗与缴获比为4.48:1。^②1938年3月16日神头岭伏击战中,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消耗子弹29492发,缴获子弹2556发,子弹消耗与缴获比为11.54:1;4月16日长乐村战斗中,该团消耗子弹32694发,遗失子弹110发,缴获子弹230发,子弹消耗与缴获比为142.63:1。^③一二〇师1938年7月至11月间消耗步马枪弹、驳壳枪弹、手枪弹、冲锋枪弹及轻重机枪弹共216375发,手榴弹4356枚;缴获步马枪弹、驳壳枪弹、手枪弹、冲锋枪弹及轻重机枪弹共37359发,炸弹^④576个,各种炮弹55发。子弹消耗与缴获比为5.79:1,手榴弹消耗与缴获比为7.56:1。^⑤八路军总部统计,1939年4月间各部共消耗手枪弹与步机枪弹20.52万余发、炮弹1300余发,缴获子弹2350余发、炮弹46筒。子弹消耗与缴获比约为87.32:1,炮弹消耗与缴获比为28.26:1。^⑥1939年5月9日至15日青羊口、口泉、细腰涧战斗中,一二〇师消耗各种子弹121474发、手榴弹1542枚、迫击炮弹69发,缴获各种子弹12644发、各种炮弹104发。子弹消耗与缴获比为9.61:1,炮弹消耗与缴获比为1:1.51。^⑦1939年秋陈庄战斗中,晋察冀军区部队弹药消耗与缴获比为5:1。^⑧1939年初冬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的弹药消耗与缴获情况为:消耗子弹2.5万余发、79子弹3.1万余发、轻机枪弹3万余发、重机枪弹2万余发、手枪弹350余发,共计子弹10.6万余发、手榴弹2100余枚、迫击炮弹190发;缴获步枪弹1.7万余发、轻机枪弹500发、重机枪弹5500发,共计子弹2.3万余发、手榴弹360枚、迫击炮弹2箱又69发、炮弹21发。^⑨子弹消耗与缴获比为4.61:1,手榴弹消耗与缴获比为5.83:1,炮弹消耗与缴获比为

①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

② 参见《平型关战斗详报》(1937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③ 参见《第772团抗战四年战斗总结报告(1937—1940)》(1941年9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109团历史资料汇编》,第279页。

④ 此处“炸弹”,应指手榴弹。

⑤ 参见杨弘、卢云山编《周士第将军阵中日记》,第162页。

⑥ 《本军四月份战斗统计》(1939年X月6日)(档案原缺具体月份),《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一二〇师战史》编写办公室1994年编印,第466页。

⑦ 参见《神堂堡细腰涧战斗详报》(1939年5月16日),《五月份上半月各次战斗详报》(1939年5月23日),《细腰涧战斗经验教训详报》(缺日期),《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5),第340—343页。档案中给出的弹药缴获总数计算有误,文中所用乃是重新计算的数字。

⑧ 《军事问题报告提纲》(1940年7月17、18日),聂荣臻传记编写组编:《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⑨ 参见《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1939年12月14日),《杨成武军事文选》,第88页。

2.02:1。^①1940年5月5—7日白晋路北段破击战斗中,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损耗步马枪、轻重机枪、手机枪及驳壳枪弹共28225发,手榴弹470枚,迫击炮、山炮与机炮弹166发;缴获步马枪弹1536发,手榴弹3枚,掷弹筒弹3发;子弹消耗与缴获比18.38:1,手榴弹消耗与缴获比156.67:1,炮弹掷弹筒弹消耗与缴获比55.33:1。^②1940年10月,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报告中指出,过去一年中,所部弹药消耗与缴获比为5:1。^③从以上材料可以推定,百团大战前,八路军对日作战中子弹消耗与缴获比多高于4.5:1。炮弹消耗与缴获比,在战果较好的情况下,能接近“收支平衡”或略有富余,但在战果较差时,消耗则远远多于缴获。至于手榴弹消耗与缴获比,因上述战斗消耗与缴获统计中,一部分战斗只列出手榴弹消耗数字,而未提及手榴弹缴获数字,或者列出手榴弹无缴获,故无法以较为准确的比值估算。但“人不敷出”情况亦应相当严重。

百团大战后^④,八路军在作战中的弹药消耗与缴获情况也不乐观。如太岳纵队1942年消耗^⑤步马枪弹、轻重机枪弹、短枪弹及冲锋枪弹349450发,手榴弹10515枚,炮弹掷弹筒弹1311发;缴获步马枪弹、轻重机枪弹、短枪弹、手机枪弹及自动枪弹74624发,手榴弹339枚,炮弹掷弹筒弹20发;子弹消耗与缴获比为4.68:1,手榴弹消耗与缴获比为31.02:1,炮弹掷弹筒弹消耗与缴获比65.55:1。^⑥冀鲁豫军区1941年与1942年消耗^⑦各种子弹数分别为672165发与529654发,炸弹数为29027个与20219个;缴获各种子弹数分别为105321发与125119发,炸弹数为3624个与5601个;子弹消耗与缴获比分别为6.38:1与4.23:1,炸弹消耗与缴获比分别为8.01:1与3.61:1。^⑧

百团大战中,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弹药缴获与消耗情况如表3所示,一二九师子弹消耗与缴获比为3.61:1,炮弹掷弹筒弹消耗与缴获比为1.27:1,手榴弹消耗与缴获比为4.93:1;晋察冀军区子弹消耗与缴获比为4.13:1,炮弹掷弹筒弹消耗与缴获比为1:1.77,手榴弹消耗与缴获比为18.97:1。比较百团大战前、百团大战中与百团大战后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的弹药消耗与缴获情况,可以发现,就最重要的子弹项言之,八路军百团大战中的消耗与缴获比低于百团大战前与百团大战后的消耗与缴获比;炮弹掷弹筒弹的消耗与缴获比至少没有高于百团大战前与百团大战后;手榴弹的消耗与缴获比可能略低于百团大战前与百团大战后的消耗与缴获比。总体而言,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弹药消耗与缴获的整体情况应优于百团大战前与百团大战后。

此外,百团大战截断正太路交通达月余,同蒲路交通半月,平汉路交通五天左右。据日军统计,正太、同蒲及平汉铁路共44681米道轨,93米隧道以及1014米桥梁被破坏。其中,平汉铁路受损程度较轻,8月25日恢复运行。同蒲铁路则于9月8日全线开通。被严重破坏的正太铁路至9月20日才完成“应急复旧工程”。^⑨又据时人回忆,1938年晋察冀军区组织交通破击战,“最长阻断平

① 宁造八二迫击炮弹药箱装弹2发,连箱全重10公斤。雁宿崖与黄土岭战斗中所缴获之迫击炮弹2箱即按宁造八二迫击炮弹药箱装弹数折算。

② 参见《三八五旅白晋路北段破击战役战斗详报》(1940年5月5日—5月7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抗日战争战史附件·资料选编》,第17—18页。

③ 参见《吕司令员在第三次政治工作会议上的军事报告》(1940年10月),《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9),第468页。

④ “百团大战后”,大致范围指的是1941—1942年。1943年,日军开始有意识收缩,伪军接替守备。

⑤ 此处的“消耗”,包括损坏与遗失数。

⑥ 参见《太岳纵队全年作战工作总结报告》(1942年12月31日),《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2),第380、382页。

⑦ 此处的“消耗”,包括遗失数。

⑧ 参见《冀鲁豫军区1942年工作初步总结》,张文杰、孙建岭主编:《冀鲁豫抗日根据地》(2),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73页。冀鲁豫军区统计中的炸弹,应指手榴弹。

⑨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廖运潘译:《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版,第555—557页。

汉铁路通车三天。当时都认为是很了不起的胜利”。^①可以说,百团大战的破击效果令之前的破击战相形见绌。与交通线被截断相伴随,日军的通信设施与矿山也遭受严重破坏。日军统计,2440根电线杆或被切断,或被倒坏,146公里电线被切断;井陉新矿至少半年不能产煤。^②因此,八路军对交通线的宽大正面破击令日军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结合敌我伤亡比、毙伤一名日军所耗子弹数、弹药消耗与缴获比、截断日军交通线时间以及对日军造成的经济损失而进行综合评估,百团大战的战果尚属不差。

表3 第一二九师与晋察冀军区百团大战弹药缴获与消耗统计表

	子弹			炮弹掷弹筒弹			手榴弹		
	消耗	缴获	比例	消耗	缴获	比例	消耗	缴获	比例
第129师	771215发	213402发	3.61:1	2995发	2359发	1.27:1	21369枚	4333枚	4.93:1
晋察冀军区	513122发	123147发 另2箱	4.13:1	877发	1557发	1:1.77	28285枚	1491枚	18.97:1

说明:(1)表中所列子弹、炮弹与手榴弹缴获与消耗数量,指百团大战三个阶段缴获与消耗总数,且消耗数量包含损失、遗失数。

(2)虽然百团大战在1940年12月5日已宣告结束,但是,各战略区实际情况并不一致。此时,除一二九师反日军报复性扫荡作战已结束外,晋察冀区与晋西北区实际上仍在进行反扫荡作战。基于事件的连续性,故晋察冀区的统计数据包含12月5日至次年1月4日的战果。

(3)子弹项目统计中,一二九师缴获项包括步马枪、轻重机枪与短枪弹;消耗项包括步马枪、短枪、轻重机枪、自动步枪及手花机枪弹。晋察冀军区消耗项包括步机枪、手花机枪、驳壳枪、手枪以及自动枪弹;缴获项包括步机枪弹与冲锋枪弹,其中“另2箱”指两箱冲锋枪弹。不过,现有材料并未提示子弹的型号,所以,两箱冲锋枪弹约数量只能估算。以0.45冲锋枪弹500发装一箱为标准推算,两箱冲锋枪弹应有1000发。故将两箱子弹折成1000发,以便计算子弹缴获与消耗比。

资料来源:《晋察冀军区百团大战总结报告(摘要)》(1941年1月26日)、《第一二九师遂行百团大战三个阶段的战绩统计表(摘要)》(1941年2月1日),何理、王瑞清、刘威编:《百团大战史料》,第187、203—204、236—239页。

四、余论

遵循并尽可能发挥既有战术原则,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取得了尚属不错的战果。只不过,对八路军而言,发动如此大规模的破击作战所付出之代价仍显过于沉重。一方面,百团大战消耗大量弹药而无法获得足够补充。虽然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的弹药消耗与缴获比低于以往,但这种减少亦不是质的改变。加之除对日作战缴获外的主要弹药补充源头或断绝,或萎缩,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后弹药补充异常困难。日军判断,中共“积蓄之资材,现已荡然无存,根据地设施被摧毁。且由于与重庆关系之对立激烈,军费之负担亦属困难,欲重建应非短期间所能达成”。^③另一方面,百团大战后无法获得充足的新兵补充部队减员。如一二九师战后统计,百团大战中该师各部伤亡7362人,失联450人^④,全师百团大战战斗减员达7812人。战后补充部队减员时,一二九师面临巨大困难。太行、太岳区此时已无力补充一二九师的减员,冀南区虽然集中地方游击队员5700余人送至三八

① 王耀南:《王耀南回忆录》,第300页。

②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557—558页。

③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603—604页。

④ 《第一二九师遂行百团大战三个阶段的战绩统计表(摘要)》(1941年2月1日),何理、王瑞清、刘威编:《百团大战史料》,第237—238页。

五、三八六以及新一、四、七、八、九、十旅,但因裁汰不合格者以及补充兵大量逃亡,实际留下者不到2000人。而冀南区亦因大量抽拨地方游击队,导致地方武装数量锐减,极大影响了根据地的巩固。^① 决死一纵二十五、三十八团在百团大战中伤亡过大,战后又得不到足够的新兵补充,最终只得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取消决死一纵四十二团建制,抽该团一、二营补充二十五、三十八团。^② 在这种情形下,八路军总部所设想的第二次大规模破击亦不可能再组织执行。^③

相较于八路军的内部问题,八路军所处外部环境更趋恶劣则是更严峻的问题。对日军而言,遭受如此重创不啻一针猛醒剂,对其统一全军上下认识、致力于“剿共”作战有相当推动力。尽管早在1939年12月华北方面军召开的情报主管会议上,方面军参谋长笠原辛雄已“强调今后华北治安的癌即为中共党军,如何击溃此一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的结合之上的抗战组织,实为现阶段治安肃清的根本,必须深加认识,并期勉、建立周密的情报组织,力求掌握敌人抗战力的实际状态”。^④ 1940年初,日军肃清、建设规划也明确把重点放在“共产系杂牌军之剿灭”上^⑤,但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仍显不足。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在百团大战初期打得日军措手不及,除了八路军隐蔽措施得当外,日军态度上轻视八路军亦是重要原因。当事者回忆道:“后来想到,确实有其征候。若能加以综合判断,或可有所了解,只是当时对其过于轻视所致,此亦为上至高级司令部下至第一线之警备队之共同心情。”^⑥ 经历百团大战,日军态度明显发生转变。岛贯武治指出,1941年制定之“肃清建设三年计划”着眼于“机动性之攻势”与“有计划之措施”,因为“历来之高度分散配置,并无一定之时期性肃清目标,因而自然成为静的防御态势。日军若不主动进行讨伐、扫荡、‘剔抉’时,中共亦不致招惹于我。暂时尚能保持平静,彼此之间仿佛已有不可侵条约之存在。但在此敌我共存之间,中共却在隐秘之中进行民众工作,以充实其力量,俟其准备完成,即一举转为攻势打击日军。百团大战即为其中一例”。^⑦ 百团大战后,敌后战场的日军更加凶残进攻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即日军战史所言:“在经过中共所实施之百团大战的考验后,力求澈〔彻〕底扩充治安诸措施之结果,绩效莫大,并以此为主要原因,使华北之治安于昭和十六、十七年间,破例的有所改善。”^⑧

正因如此,中共党内关于应否发动百团大战发生争议。在华北座谈会上,百团大战问题被提出讨论,并受到尖锐指责。杨尚昆回忆,座谈会“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团大战……毛主席这时没有说百团大战不对。他说抗日战争期间的问题要等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才能作结论、才能说清楚,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不作结论。这样,表面上是不了了之,实际上是把问题挂起来了,彭德怀同志很不高兴”。^⑨ 薄一波则具体回忆会上批判百团大战的内容,即“集中在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上,认为此次战役的发动,在敌人面前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错误’,从而使华北根据地

① 参见王宏坤《再忆征战生涯》,第59、73页;刘伯承:《第一二九师一九四一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12月),《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2),第107页。

② 参见《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山西新军决死一纵队》(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决死一纵队司令部关于队务工作的总结》(1941年),《山西新军决死第一纵队》(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

③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结束时,八路军总部在致各部电中就已提出准备短期内再发动一次大的破击战,但最终不了了之。1941年5月,八路军总部要求各部研究“多种多样灵活的交通破击的有效方法,以达到不使用大兵力也能使交通战广泛长期的开展起来”。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结束后部队中应有的解释与准备》(1940年10月2日),《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54页。

④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352页。

⑤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431页。

⑥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537页。

⑦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826页。

⑧ 《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652页。

⑨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进入了困难时期”。^①

对于当时力量尚属弱小的中共来说,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与其所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毛泽东早在《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已经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②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变化^③,1943 下半年后华北中共根据地再次发展亦与外部环境变化紧密相关。^④1939 年后,随着日军回师华北、中共力量蓬勃发展及华北国民党军势力逐渐衰弱,中共武装及其根据地逐渐成为日军巩固占领区的最大障碍。面对日军步步紧逼,彭德怀的硬打不但没有改善中共所处的外部环境,反而令日军更加警觉,极易引起党内不满。

相较而言,中共 1942 年后逐渐发展成熟的另一种抵抗方式更适合弱者生存。黄敬撰文谈道:

从根据地来说,我越刺激,敌之警觉越高……尽量使敌麻痹,一面在对敌斗争中把力量拿出来,一面要隐蔽一部分力量,让敌人瞧不起我们。要刺它,又不要集中对我……不过分地刺激的标准,就是不使敌再增加力量到这里来,而我们又可以自由地开展斗争和各种工作,使敌我完全都满意(敌是阿 Q 式的满意)。

不过分地刺激敌人而决定于时间、地点和条件,如在我基本区周围不要过分刺激,吸敌到我处来;我则要去刺激敌之侧后,把目标转到其侧后,故对有些老敌区要去刺激它,必须要使其精神转移,无论反“蚕食”、“扫荡”,都不要用顶的办法,越顶越糟糕。□□地点,也不是说凡敌区都要大吹大擂,要找出哪里是敌之要害,哪里是我之要害,你来搞我,我去搞你。另一条件是我要有报复性的刺激,当敌要向我大“扫荡”时,我要报复,使敌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⑤

但黄敬的认知毕竟是百团大战后的结果,这种方式能否在 1940 年即被采用,彭德怀在华北座谈会上所作的报告有所保留。他说:“敌人乘机加紧对我分割蚕食,形势是严重的。因此决定一个大破袭战,想把敌人从根据地内调动出去……今天看,用武工队、政治攻势也可以调动敌人出去,但问题很简单,那时不会。这是在以后的形势下才想出来的”。^⑥彭德怀强调“敌进我进”政策的提出与特定环境相关,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历史本来就是不断演进的,受制于特定的历史场域,历史人物的选择空间也许远远没有后来者所设想得那么大。根据结果倒推作出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却又不可失之过苛。

[作者邹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70 页。

②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 年 10 月 5 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1),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9 页。

③ 参见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7—89、189—194 页;《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平原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47—63 页。

④ 冀中根据地在 1942 年“五一”扫荡后变质,冀中临时区党委估计国际国内出现有利形势变化之时,才有可能恢复根据地。1943 年 4 月,冀中区党委进一步指出此种国际有利形势就是战略反攻或接近反攻的时期。参见《中共冀中临时区党委对冀中形势及任务的指示》(1942 年 11 月 7 日),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34 页;《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青纱帐时期工作方针》(1943 年 4 月 12 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第 69 页。

⑤ 黄敬:《对敌斗争报告》(1943 年 11 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12 页。

⑥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第 295 页。